

■综述

在回望中突围

——关于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思考 □蔡家园

新时期以来,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得了长足发展。从创作队伍来看,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作家梯队,有的还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李传锋、叶梅、温新阶、王月圣、杨秀武、邓斌、甘茂华等“40后”、“50后”作家,堪称中流砥柱,野夫、田天、吕金华、刘小平、田苹、唐敦权、周良彪、覃国平、雨燕(罗晓燕)等“60后”作家创作势头正健,向迅、陈克海、谈骁、董祖斌、何泽勋、付小平、罗晓、沧溟水(杨亚玲)等“70后”、“80后”作家已经崭露头角。从创作成果来看,有一大批作品屡获全国或省级文学奖,如《退役军犬》《田天报告文学选》《巴国骊歌》《他乡故乡》《五月飞蛾》《远去的诗魂》《白虎寨》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不少作品获得湖北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总体而言,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仅在当代湖北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即便放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格局中来考量,也颇多可圈可点的亮点。湖北少数民族作家秉持初心,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开辟出了一片五彩斑斓而又独具丰神的文学天地。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

一是自觉地与当代文学主流保持着对话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到全新历史阶段,文学艺术也开启了新的发展时期。湖北少数民族作家尽管大都地处偏僻的鄂西,但是不少人具有较强的敏锐性,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保持着高度敏感,紧紧追踪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风尚,努力把握社会发展主流;另一方面努力追随中国当代文学前进的步伐,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不断更新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因此,一批作家能够较快地融入时代文学发展大潮之中,并且以鲜明的民族特色脱颖而出。这个特点在李传锋和叶梅两位作家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崛起,李传锋的《退役军犬》批判极左思潮,一经发表就在全国产生较大反响;改革文学兴起,李传锋又以《定风草》《烟姐儿》汇入其中;在寻根文学大潮中,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等追寻土家族根性的作品,引起广泛关注;当生态文学蔚然成风之后,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红豺》成为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关注底层生活的文学潮流中,叶梅的《五月飞蛾》也引人注目。从这两个个案中可以看出,湖北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而且有着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他们凭借对生活独特深刻的理解和个性化的表达,在文学场域中努力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他们作品的主题存在鲜明的异质性,像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审视和批判、对于山外世界(现代文明)的热烈向往、对于民族历史传统迷失与现代病泛滥两难困境的揭示等等。这种“和而不同”,构成了湖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

二是多维碰撞中书写“文化乡愁”。丰富独特的土家族、苗族历史文化与斑斓多彩的自然生态、民俗风情,构成了萦绕于鄂西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文化乡愁”。在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鄂西早已不再是方外之地,湖北少数民族作家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震荡,也陷入新的困惑与思索,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聚焦民族的“文化乡愁”,虔诚追寻着精神家园。其中一类作品侧重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发掘。像《武陵王》系列小说,立足于土家文化、鄂西地域文化的大背景,着眼于民族文化变迁中的碰撞和融合,生动地表现

了土家族的起源、土家族经历的重大历史转折和经受的磨难,以及整个民族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崛起,深刻地揭示了土家人独特的性格特质与民族精神,对民族文化根脉进行了深入探寻。更多的作品热衷于对地域民俗风情的展示。以杨秀武的《巴国骊歌》等为代表的一批诗歌,聚焦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山水风光、民俗风情,表现土家族、苗族的文化生态与精神生态,堪称民族生活志和风俗志。杨秀武笔下的“清江”、“大山”、“老街”,已成为富有意味的地域文化符号,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另外,叶梅、温新阶、邓斌、甘茂华、向迅、董祖斌、何泽勋等人的散文,则从不同的侧面塑造着一个浪漫、浑厚、淳朴、野性而美丽的鄂西世界,引人回味。还有一类作品侧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最具代表性的是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黑蓼竹》《山中有个洞》《最后的土司》等小说,深刻地表现了土家族崇尚自然、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开放自律、情爱自由等伦理道德观念和情感态度在剧烈变革时代遭遇的冲击与挑战,揭示出土家族特有的文化心理。这三类作品对浓郁的“乡愁”进行审美化观照,不仅生动地绘制出鄂西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的斑斓画卷,而且也深刻地雕琢着土家族、苗族的独特民族形象。

三是从边缘出发,反思人类生存困境,执著追寻价值理想。新时期以来,湖北少数民族作家逐渐摆脱了狭隘、肤浅的社会意识和乡土意识,立足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传统,从边缘出发,理性地将民族精神、家国观念以及人类意识有机融合,自觉而自信地参与到时代文化精神的建构之中。李传锋从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展开关于人类命运的现代性反思,像《最后一只白虎》借哀婉珍稀野生动物的悲剧命运拷问人性,《红豺》思考人类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守护自身的精神家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土家族民族生存的寓言,充满了沐浴生命光辉的价值关怀。叶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龙船河”、“土司”、“娃娃要过河”、“西兰卡普”等意象和情节,更是寄寓着一种建构民族文化家园的理想。她试图通过对鄂西少数民族强悍精神的再发现,来探寻一种救治现代文明疾病的新资源。吕金华的《黑烟》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浓缩为两个人的战争,象征了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向迅的散文《鄂西笔记》《谁还能衣锦还乡》,在与历史、与世界的对话中参悟世间万物的奥秘,思索生命的终极价值。湖北少数民族作家因为地域上的边缘性,使得他们常常能够主动或者被动地从流行风潮中抽离出来,冷静而理性地反观自我,反思世界,反而极大地张扬了主体意识,迸发出审美创造活力。从边缘出发反思存在之困、建构价值理想,这是湖北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立场和姿态。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对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坚守是否还有可能呢?从空间角度来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地域文化的差别将越来越小,各民族也将难以维持他们的传统,整体趋势是走向无差别的融合。如果依然寄望于在地域区隔中展示民俗风情的奇异性和文化心理的独特性以凸显文学特色,显然不再拥有过去的优势了。当然,朱光潜也说过,“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普遍性与连续性的完整的生命。惟其有普遍性,它是弥漫一时的风气;惟其有连续性,它是一线相承的传统。”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力在未来也不会完全消失,只是更多地将以“历史传统”的方式融入时代潮流之中。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要想

获得更大突破,除了吸收已有的成功经验,还需要深入思考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这里说的“中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指当代文学主流构成的“大中心”,它的价值观念、美学原则、文学趣味构成强势话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次是指鄂西文学创作形成的“小中心”——对地方性知识的自觉追求本来是文学本土化的重要策略,但是当它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之后,就会导致模式化书写,而且容易引发群体模仿效应。无论是“大中心”还是“小中心”,都会形成像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严重制约鄂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拓展和提升。因此,写作者固守边缘位置显得尤为重要。从社会历史的边缘出发,充分张扬主体意识,以精神漫游的方式抵抗规训,更加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以个人化的话语方式达成审美的“陌生化”。

二是怎样在“出走”中“返回”。现代文明强大的感召力和吸附力,不仅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导致人们在人文精神层面大量“出走”,去追寻现代性精神,试图以此重新激发古老民族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主体意识已然觉醒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民族身份的危机感日益凸显,他们开始思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因此,他们又开始“返回”,试图寻找本族群的精神家园。此时的“返回”已不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经历了文化碰撞、融合与蜕变之后的心灵回望。这种回望不是仰视、俯瞰或平视,而是像罗兰·巴特说的“斜目而视”。正是在“出走”与“返回”之间的“再发现”,形成了强大的思想张力、文化张力和审美张力,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打开了新的罅隙。很多客居他乡的湖北少数民族作家,都经历了这样的精神还乡历程。当他们身处鄂西时,对于家乡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以及人事的书写可能还是自发的、平面的、单向度的,但当他们走出大山之后回望故乡,凭借新的文化坐标和审美参照,在否定之否定后实现了对于民族传统的自觉认同和审美“再发现”,文学创作也开辟出了新的空间。在“出走”与“返回”的途中,他们拥有了更为强悍、阔大和深邃的精神能量和全新的话语方式。

三是如何由“奇观”抵达“秘史”。对地域性民俗风情、民族人物、历史故事作“奇观性”展示,是少数民族作家经常陷入的写作误区。如果只专注于生活的表象,而忽略去开掘深藏于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自然难以深度表现民族的心灵秘密乃至共同的人性。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碎片化的认知方式,写作者因而缺乏整体性的历史文化意识。所谓历史文化意识,指对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构架,即文化起源、历史进程、基本形态、主要特征的总体性把握。只有当一个作家拥有了较强的历史文化意识,他才有可能穿透表象抵达本质,比较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积淀造就的民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心理结构,正是这些因素深刻地塑造着民族特性,影响着民族秘史的生成。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整体性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去观照“日常生活”和“生活之奇”,实现向“日常审美”的转化和向“人性之奇”的勘探,在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度开掘中抵达民族的根性,这才有可能书写出“民族的秘史”。

坚持边缘立场,坚守文学初心,迎着过去向未来进发,相信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声音

诗歌创作要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社会,这是诗歌界长期以来的强烈呼声。这种声音的出现,主要源自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和背景:(一)个人化写作的盛行,让很多诗歌沉迷于琐碎的生活经验之中,诗人由此丧失了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能力,诗歌变成了对生活碎片的简单记录,却无法对时代和社会的总体状况进行言说;(二)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诗歌已经不再居于舆论场域的中心,是否能够通过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让诗歌成为建构情感共同体的媒介;(三)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人民群众正在进行伟大的创造实践,精彩的中国故事不断上演,我们的现实生活比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都要精彩、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呼唤那些能够反映时代气象的大诗、史诗。

因此,这种呼唤诗歌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声音,有着诗歌发展内部的必然性。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些人认为,诗歌和政治挨得太近了。进而朦胧诗、第三代诗等一代代新诗人站起来,提出了不一样的观念,从关注、表达集体经验,转到关注个人价值、书写个体的日常生活。“个人化写作”、“及物性”也成为了90年代诗学的重要概念,并一直影响至今。如今,我们似乎厌烦了这项琐碎的一切,又呼吁要“整体把握时代”。但很显然,这并不是回到原点,因为时代不一样了,诗人也不一样了,诗人的主体已经严重分化,他们面目各异,有着不同的诗学理念和技法。但无论如何,这必然要求诗人穿过碎片化的现象找到背后的“总体性”。

这的确是不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作家、诗人的宿命。诗人从具体的事物入手,通过完整的诗意呈现,总能够抵达一些共通的经验。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诗作,从具体的人和事写起,但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当然,“诗人的个体写作”和“诗歌的社会性”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一再强调“诗歌要更好地反映现实”、“诗歌要有公共性、社会性”的时候,并非是基于一对“个体化写作”的完全否定,而是说,我们目前在诗歌的个性化、个人化方面做得不错,但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还需要加强。实际上,优秀的诗歌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视角和语言去呈现具有公共性的经验。正如卢卡奇在《现实主义问题》中说过的:“任何伟大艺术的目标,都要提供这样一幅现实的图像,在那里看不到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因为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汇集成为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传播得比较广的一些诗歌,大都是无意中暗合了某些时代心理的作品。这个时代性是丰富的,它有多重面孔。如果每个诗人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抒写好这个时代总体性的每一个侧面,汇总起来,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总体性。

当前诗坛存在很多具有担当意识的诗人,他们关心底层的弱势群体,关注社会的热点事件,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但是,随着热点事件一过,很多诗歌就不再有人去读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是为了“介入现实”而“介入现实”,有的诗人把诗歌写得跟新闻报道一样。特别是在当下,网络非常发达,网络浏览代替了实际的生活,很多写作者浏览几条新闻,几张照片就开始写诗了,其诗歌中就会缺乏情感的嵌入和沉淀,也没有什么精神内涵和思想力度。有一次,有一位诗人寄给我一本诗集,恰巧同事也认识这位诗人,就随手拿去翻阅。他看了之后说:“这就是把一段新闻,分行排列就可以了!这我一天能写个几千首!”如果我们的诗歌不能够就现实细节进行诗意提升,就不可能获得更多读者的支持。诗歌介入现实有其独特性,它总是跟现实好像隔了一层,但却能真正抵达现实的本质。这就如同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讲的“诗酒饭”,诗人要把“粮食”转化为“酒”,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饭”、甚至还是没熟的“米粒”。诗人在创作中要将写作素材进行心灵化、体验化、内化成自己生命的有机部分,然后再用语言将之生动呈现出来。

“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伊格纳顿的这句诗鲜明强调,诗人用诗歌来反映现实,终究到底必须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实现。通过喊口号的方式来传达主题、思想,可能看起来很大声、很热闹,但其影响力也会很快消散的。诗人必须依托高超的艺术转化、艺术传达能力,将现实生活真实反映出来,进而才有可能冲击广大读者的心灵。因此,在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警惕,有人借此而把诗歌写成为一种策略写作或社会学层面的庸俗化写作,故作高调、故作姿态。诗歌的社会性,不应该只是从诗歌写作所涉及的题材和作品的数量来考量,还应从诗歌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考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诗歌的社会性被庸俗化。

诗歌要反映好现实,诗人的主体人格必须建立起来。面对现实,诗人不能要加歌颂或批评,而是必须首先做到如实地记录,在此基础上再作出感性、理性的判断。诗人要捍卫人格的独立、捍卫真实的记忆,这是诗人保持言说有效性的基础。诗人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说谎(哪怕用沉默来代替),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假如你不参加撒谎的这种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就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在诗歌创作领域,尤其能够体现人品、文品的同一性。在这个时代,诗人要重新树立起“知识分子形象”。他也许无法像以往那样成为一个高大的“立法者”,但应该成为一个理性的“记录者”、“阐释者”。这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网民容易形成情绪化的反应,但诗人必须保持清醒,站在一种总体性的视野之中,去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诗人要反映现实生活,需要他具备较好的同理心。当一个诗人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其实是置身于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联之中。正如诗人沈苇所说,“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的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自然之死、同类之死,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这就是人类美德中的‘一体同悲’,它同样是诗歌的美德之一。”诗歌仅仅表达自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表达他人的处境。对他人的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仅仅隐含了强化灵魂之活力、体验自我之力量的朴素愿望。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诗人要成为“时代的感应器”,深化自身对时代的感受力和回应能力,增强用诗歌来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

诗歌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

□黄煜榕(壮族)

学界研讨朝鲜族文学研究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朝鲜族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座谈会暨张春植研究员荣休仪式在京举行。

张春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解放前朝鲜族短篇小说研究》《时代与我们的文学》等理论著作和《阴盛阳衰》等作品集,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朝鲜族“檀君文学奖”评论奖等。与会专家学者对张春植36年来对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奉献,对他从事朝鲜族文学研究始终秉持的客观、公正、一贯的治学态度,对朝鲜族移民文学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朝鲜族文学研究取得的开拓性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关于朝鲜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与会专家学者谈到,批评家和学者们要更多关注朝鲜族青年作家的成长。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是用朝鲜语进行写作的,希望有更多的译者能够将其中的优秀作品翻译成汉语。与此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朝鲜族学者能够使用双语进行阅读、评论,积极建构朝鲜族文学与其他各民族文学进行交流的话语场,不断扩大朝鲜族文学的影响力。(欣 闻)

中国美术馆举办“民族大团结”雕塑展

本报讯 3月2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办的“民族大团结——全国雕塑艺术作品展”在京开幕。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征集作品600余件,经专家委员会初评、复评,最终有220余件作品入选。展览以赞颂民族大团结为主题,分为“民族团结”、“各民族风采”两大篇章,以雕塑艺术全面反映我国各民族的民族历史、民族生活、民族风俗,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水平、新成就。

主办方表示,民族题材历来是美术创作的重要领域,是现当代雕塑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凝聚着一



代代雕塑家的民族情怀和时代使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具备民族性的艺术会显示出其鲜活的生命力。
图为参观者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展出作品《壮乡三月》(新华社记者 鲁鹏摄)